

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 與蘇聯文藝學問題

日·維諾格拉陀夫等著



時代出版社



斯大林論語言學的著作與 蘇聯文學問題

B.維諾格拉陀夫等著
張孟恢等譯

時代出版社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И ДР.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Я В
СВЕТЕ ТРУД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ПО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зд.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51.

版 權 所 有

1952年12月北京初版
1953年2月第二次印刷
10,300—25,300册·定價7,900元
32開·286定價頁



時 代 印 刷 廠 排 版
新 華 印 刷 廠 分 廠 印 刷
源 豐 裝 訂 局 裝 訂
新 華 書 店 華 北 總 分 店 總 經 售

目 次

譯者前記.....	三
蘇聯文藝學的當前任務.....	(B·維諾格拉陀夫) 五
略論文藝學的幾個問題.....	(A·葉高林) 三
文學的社會意義.....	七
俄羅斯文學的民族特性.....	(M·杜勃雷寧) 一三
論文學的人民性問題.....	(Д·布拉果依) 二三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A·伊瓦盛科) 一四七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幾個問題.....	(B·葉爾米洛夫) 一五二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譯者前記

斯大林的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發表一週年紀念前夕，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與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根據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的決定，於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學者之家』聯合召開了一次根據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討論文藝學問題的科學會議，參加會議的達數十人，包括各加盟共和國的科學院及蘇聯科學院各地分院、聯共（布）中央社會科學研究所、教育科學學院、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學者專家，莫斯科大學的教授，莫斯科各高等學校的教授講師等。

會上，B·維諾格拉陀夫、A·葉高林、M·杜勃雷寧、Д·布拉果依、A·伊瓦盛科、B·托馬舍夫斯基、B·葉爾米洛夫七人作了專題報告，并在會上進行討論。五一年年底蘇聯科學院出版局曾將這七篇報告編爲專集出版。

我們的譯文是根據經作者修改而發表在蘇聯各大雜誌上的原文譯出來的。葉高林的報告原名蘇聯文藝學的發展道路，發表在雜誌上時，題名改爲略論文藝學的幾個問題，內容

有些改動。杜勃雷寧的報告原名作爲上層建築看的文學，作者在政治與科學知識普及協會作報告時，題名改爲文學的社會意義，文字上有些修改，基本論點未改變。布拉果依的報告原名爲論文學的民族特性，發表在雜誌上時，題名改爲俄羅斯文學的民族特性，僅刪去論及西歐文學的一小部份文字，其餘無改動。剩下來的三篇與蘇聯科學院出版局專集的原文完全相同。至於托馬舍夫斯基的語言與文學，則因爲牽涉俄文上的專門問題太多，對於我國一般文藝工作者參考價值不大，因此沒有收入。

這幾篇報告的內容，不僅是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的論點批判了存在於蘇聯文學中的庸俗化與簡單化的錯誤思想，而且還提出並闡明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如：文學的特殊性、文學的語言與風格、文學遺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民族特性、文學的人民性等。

我們認爲這幾篇報告，能給我國文藝學家、文藝工作者以及一般愛好文學的同志們以很大的幫助，使我們更深地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理論，進一步認識蘇聯文學，因此特爲編譯出版，以供同志們參攷。

由於報告所涉及的範圍很廣，限於我們的能力，恐譯文仍有錯誤和不妥當的地方，希望同志們多提意見，以便改正。

蘇聯文藝學的當前任務

B·維諾格拉德

六月二十日是斯大林的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在自由討論的過程和結果於真理報上的一週年紀念日，全體蘇聯人民和外國進步的社會人士都紀念這個有重大意義的一天。斯大林在這一著作之後又發表了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和給同志們的回答，後來合成一個集子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出版。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對整個蘇聯科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影響。在這一著作中，斯大林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史、認識論、辯證法、邏輯、人種學和人民創作史、語言學、文藝學、政治經濟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一系列最複雜的問題，所有這些科學部門正在和將在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中汲取新的創造性的思想，得出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結論和公式，得到科學發現的新刺激。同時，在這一著作中，斯大林為整個蘇聯科學思想開闢了解決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的新的巨大任務的廣闊園地。斯大林的這些經典著作對於我國科學生活的意義是不可估

量的。作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典範，它們爲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方法論和哲學上並協助着共產主義建設的偉大綱領順利實現的整個蘇聯科學確定了一般的總的發展路線。

「馬克思主義，」斯大林指示，『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斯大林同志把蘇聯語言學從錯誤的、但被H·A·馬爾院士貼上『語言的新學說』這一動人廣告招貼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引導它走上了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廣闊道路。在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中，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完美的、透徹的、深刻的一般理論用非常簡潔、準確、明白易懂的形式敘述出來，所有最重要的問題都包羅無遺。在這裏，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範疇：作為社會現象的語言的特性，它對生產、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它的全民的性質，它的發展的內在規律，它的結構，它的構成要素，它的社會機能，它和思維的聯系，第一次得到了嚴格的科學的確定。語言發展的社會條件、它和人民的歷史的聯系、它在人類發展史中的作用被一目了然地確信地展示了出來。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以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強烈光芒照耀着社會科學中和語言學接近的各個部門。這些著作標誌着蘇聯語言學發展中的根本轉折點和新的斯大林階段的開

始，並向文藝學提出了新的任務。

說到文學，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我們應該遵照斯大林的指示，把基本注意力集中在作為社會現象的文學的特殊性質上，集中在文學內容的複雜性、多樣性和內在矛盾上，集中在文學和其他社會現象——包括各種形式的上層建築——的多方面聯系和相互關係上。斯大林提出了社會生活中各種現象的特殊性以及相互聯系相互依託的問題。И·И·巴甫洛夫院士說，事實——這對於科學來說是空氣，理論是它的翅膀。對於文學來說，社會生活的事實和現象就是空氣，而從藝術上來理解和概括這些事實和現象，是在全民性的、和人民的生活及歷史不可分地聯在一起的語言的基礎上實現的。作家的翅膀就是他的世界觀，而飛翔的高度則取決於藝術技巧和反映生活真相的高度藝術性的形式。把藝術文學一般地歸爲上層建築，不顧到它的特殊性，不顧到文學和一般人民的民族語言及其表現手段的發展之間的聯系的獨特性，勢必使文學和其他形式的上層建築完全混同起來，而取消藝術性與文字藝術。這樣一來，藝術文學就和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即哲學、社會政治觀點、法律、宗教和其他社會思想毫無區別了。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到恩格斯給梅林的信（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中的一個地方：『……起初人們總是只顧內容而不注意形式。』由此，夾在其他社會現象中的藝術文學的特殊性就被

抹除了。但斯大林教導我們要深刻地探究社會現象的使彼此（各社會現象）互不相同並對科學最爲重要的特殊點。

高爾基在他的俄國文學史中強調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和革命思潮的緊密聯系，得出結論說：『俄羅斯文學家……在自己的形象和概括中，是比西方的文學家遠爲廣闊和客觀的，因爲雖然照他的心理基礎來說他是有階級性的人，但他得把自己提高，超出自己階級的狹隘任務，他所需要關心的與其說是研究階級的思想意識，還不如說是對政府的思想和行動作鬥爭。』既然承認作爲社會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的文學的特性，蘇聯文學家就要深入研究俄羅斯文學或其他民族文學發展的內在特殊規律，同時連帶考察文學和歷史運動的一般社會歷史背景。

斯大林說明作爲社會現象的語言的特性，強調研究語言的必要，研究和社會的歷史與人民的歷史不可分地聯在一起的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的必要，他指出研究語言發展的內在規律是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在這裏，斯大林加深了、明確了並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個指示，就是在調查研究這些或那些社會現象時必須顧到它們本身的運動的獨特性，估計到由於這些現象的本性和特徵而產生的獨立的規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教導說，個別的社會現象，『個別的勞動過程』，甚至各種形式的上層建築都具有一定的

獨立性，而遵照自己所固有的運動，遵照自己的特殊的性質所「固有的規律」的。

說到這裏，提一提恩格斯給史密特一封信中的另一段話是適合時宜的，在這封信中說明了勞動的社會分工中個別領域的發展規律也有相對的獨立性。雖然那指的是哲學，但也提到了藝術文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殊領域，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有着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而這個材料是它從它的前驅者繼承下來的，而且它就是從這出發的。因此就發生這樣的現象：經濟落後的國家能夠在哲學上起領導的作用：法國在十八世紀時對英國就是這樣，法國人依靠英國的哲學，後來德國對英法兩國也是如此。但是法國也好，德國也好，哲學以及當時文學的普遍繁榮都是一種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是經濟發展在這些領域裏的最後至上權，我認為是無可爭辯的，然而它是在既定的領域本身所規定的條件範圍內才顯現出來的……經濟在這裏並不創造什麼絕對新的東西，但是它決定着現有的思想材料的改變方式與進一步發展的方式。然而就是這個，它大半也是間接地完成的，因為對於哲學發生最重要的直接的作用的，乃是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

在藝術文學及其發展規律方面，也應當注意文學傳統中各種藝術和思想派別的歷史作

● 着重點為本文作者所加，譯文見周揚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譯者。

用、累積起來的民族藝術經驗以及作為遺產接受下來的一套文學表現形式的影響。

因此，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以新的力量向蘇聯文藝學家提出了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文學的特殊性問題、文學在其他社會現象中的地位問題。

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斯大林又以尖銳明確的形式闡發了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他揭露了不管社會發展條件的變化，總是把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和公式看作是一堆『永遠』不變的教條的書呆子和學究。處理文學的歷史態度，要求細心地研究藝術文學這一範疇在社會發展的各個不同條件下在範圍和內容上所起的變化，分析文學的社會機能中的差別以及創作家和讀者人數與成分中的差別。處理文學的歷史態度要求文藝學家正確地確定藝術文學在大小民族、資產階級民族和社會主義民族的文化體系中的地位，明確地指出文學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中，在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中人民性的內容和程度是有差別的。根據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來確定全民語言和文學語言在社會發展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中相互作用形式的文學語言史著作，對於解決這些問題是有重要的意義的。

高爾基說過，文學的第一要素是語言——這是基本的工具，以及生活的事實和現象——這是文學的材料。生活的事實和現象是以、或者在任何場合都應該以概括的並在思

想上明確闡明的形式進入文學，用文學的形象和高度藝術技巧的圖畫體現出來。所以，作為文學的基本工具及材料的語言的意義，是蘇聯文藝學和語言學的中心題目之一。

高爾基在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文中寫道：『作為一種力量而發生着作用的語言的真正的美，是由規定書的畫面、性格和思想的文字的準確、明白、音響形成的。』藝術文學廣泛地和全面地反映人民的語言並影響它的發展。列寧說到偉大的強有力的俄羅斯語言時，稱它為屠格涅夫、J·托爾斯泰、杜勃羅留波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語言。斯大林指出現代俄羅斯語言的基礎和普希金的語言的基礎一樣。同時他教導說，文學的發展給語言的發展帶來巨大的變化，藝術文學不但是民族語言的寶庫，而且還是創造的實驗室，那裏可以發現藝術地運用民間口語的新手段。

斯大林的著作鮮明地說明了作為民族文化形式的語言的巨大意義，使蘇聯社會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家、詩人、政論家在民族語言發展中的作用問題上。關於藝術文學的語言，關於藝術文學的語言對於改進民間口語的作用這些題目，我國各地都組織了報告，進行了討論，這些報告和討論引起了熱烈的社會興趣。讀者對作家的語言和風格的要求提高了。尖銳地提出了藝術語言人民性的問題。對於蘇聯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學的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民間風格基礎問題取得了特殊的意義。

對全面研究人民的語言、口頭文學和民間文學（其中含有寶貴的語言表現手段和巨大的語言寶藏）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文學作品的語言中，在出版物中運用這些文字藝術寶藏的要求和必要性也感覺得更迫切了。高爾基深刻地認識到作家的這一責任，就是和人民的創作保持堅固的聯繫，深刻地探究它的文學藝術的結構、它的形象的體系。這就是他的遺訓：

『做創造字句的工作，必須知道我們的極豐富的民間文學，特別是我們的令人驚奇地精闢、中肯的俗語和諺語。「俗語永遠不會錯。」我們的語言大半帶有格言的性質，它是以繁湊、堅固為特色的。』

在藝術文學中，全民的或民族的語言連同它在文法上的全部獨特性、它的詞彙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被當作藝術創作的手段和形式來運用的。換句話說，全民語言的一切要素、一切優點和特點，包括它的文法構造、詞彙、它的意義體系、它的語義，都是藝術上概括地、典型化地再現和闡明社會真實生活的手段。

藝術文學是在全民語言的基礎上通過形象的美學加工而建立起來的。

藝術文學的語言，在運用古代的詞彙、各地人民的方言、古代文學作品的語言上要比全人民的全民族的語言自由得多。但它不能很遠的離開全民語言的構造、它的基礎、它的

文法結構和基本詞彙，否則它就不再是大家都懂得的。祇在詞彙方面，作家才有可能更決定地更遠地離開全民的範圍。當果戈理寫下關於俄羅斯語言的下面這些話時，他指的正是詞和用語這個範圍：「它是沒有止境的，可以像生活一樣的生動，每分鐘都更為豐富，一方面吸收教堂和聖經用語中的崇高的詞，另一方面從散佈在各省的無數方言中選取恰當的名稱。這樣就有可能在同一種語言中上升到任何其他的語言都無法達到的高度，並下降到即使是最蒙昧無知的人們也可以感覺出來的簡單。」

如果對一般文學語言和一般民族語言的風格沒有了解，就不可能研究藝術文學語言在風格上的多樣性。達到了高度發展的文學語言，本身就是一套支脈繁雜的、互相聯結和互有關係的風格的體系。所有這些風格的價值並不相等。它們隨應用的場合、涵義的範圍、字句和結構的成分而各不相同。無緣無故的把語言風格的一種用法搬到機能上相差很遠的另一種用法上去，就會顯得不倫不類，或者成為笑柄。二十年前，K·П·朱柯夫斯基在藝術翻譯的原則一文中曾講到一個翻譯家在譯浪漫主義的童話時用了這樣的句子：「因·無·紅的玫瑰，我的生活就要破碎了。」有人給他指出，「因·無」這兩個字用在官方文告中要恰當得多，他就劃掉改為：「缺少·紅的玫瑰，我的生活就要破碎了。」

研究這一類問題，是需要鑽研全民語言的風格學的。作為語言紀律的風格學，它的原

則和任務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明確，這門科學的基本概念和範疇也沒有確定。「風格」這個術語用於民族文學語言在機能上的不同形態時同它在表示文學作品的表現手段體系或是文學派別的表現手段體系的場合中，內容有所不同。全民語言正常化的問題和任務，消除口語中夾雜着俚語、狹隘的地方色彩的土語現象的問題和任務，必須在風格學的理論基礎上求得順利的解決。民族語言的風格學應該積極協助語言的發展。在語言學的領域中，理論和實踐的關係特別密切，並且是和實踐交織在一起的。作家的文學創作的基礎應該是從發展中去深刻了解全民語言的風格。文學作品的語言須要根據全民語言來加以接受，加以評判。

在這一類問題中，觀察文法和修辭方面的同義語，是有特別的意義的。一般人民的或民族的語言都有同義語的表現方法。研究這些表現方法，可以幫助確立它的生動活潑的風格，確定語義的發展規律。如果不研究語言在各種社會生活範圍中使用時的特殊機能，那麼就不可能研究語言的多樣的風格。

在階級社會中，一方面語言有機能上和風格上的差別，同時這當中又包含着社會方言性質的許多差別。不同的社會集團、不同的階級，既然對語言不是一視同仁，所以他們就竭力使語言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因此文學語言的風格中反映着這一個或那一個社會集團所